

几篇。其实当时一共发了四篇。

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，长期以来，很多媒体在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曾提及，皇甫平大胆吹响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角。这四篇文章被视为“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”。

我如今回想，感到当年小平同志有着政治家的战略眼光。1991年，他看到一些报刊对皇甫平文章的批评，但是他没有说话，而是选择观察了一年。然后，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，他选择到南方，发表谈话。因为他知道，这个时间节点，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大局，要为新一届中央确立发展蓝图，组成新的领导班子。在南方谈话中，他讲到，“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”“谁不改革谁下台”。讲得非常尖锐，引起很大震动。小平同志南方谈话，它就解决了一个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问题。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、管理与先进东西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用，就是社会主义的。有利于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，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，就是有利社会主义的。这就打破了我们多少年的一种传统观念啊！

小平同志南方谈话，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。后来，我发现最初赞同、拥护皇甫平文章观点的那些朋友，都勇敢地也

确实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做出了感人的政绩，成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确实，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，中国确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，改革开放加速深化发展，之后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。及至如今，我们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好，各方面的影响力也好，都有了极大的提升。比起当年，如今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之际，中外交流更为频密。与此同时，国际新闻成为不少媒体所重视的领域。您能否回忆您报生涯期间，国际新闻、中外交流中印象深刻的事？对当下有何启迪？

周瑞金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报人，作为新闻单位，在对外交流中，都可以配合我们政府的对外交流工作，开展民间的外交，或者现在讲公共外交的工作。这个我深有体会。我是1993年调到北京《人民日报》工作的。1995年，我们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。我们的国际报道部门突然接到有关部门指令，要组织批判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桥本龙太郎的文章。说他当时兼任日本遗族会

的会长，出版了对中国很不友好的书。当时我正好带一个新闻代表团到日本访问。在采访日本政要的过程中，我了解到桥本龙太郎并不了解这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，书出版后发行范围很小，社会影响也不大。而桥本作为日本首相他还是积极推行同中方发展友好关系的。我马上向国内有关领导汇报了真实情况，及时纠正了发表批判文章的举措。从中我就感觉到，新闻媒体在对外交流中可以发挥应有的民间公共外交作用，化解矛盾，补正一些政府外交无法发力之处，公共外交更容易解决问题。

后来我们曾推动温州首先成立了地方公共外交协会。因为大量的温州人在国外——企业家、各界人士都在外面做我们国内和国外的沟通交流，使海外更加了解中国，也让中国更加了解海外。这样就会化解很多矛盾，才能够合作共赢，也才能够做到比较融洽的外交关系。温州成立地方上的公共外交协会以后，后来各个地方都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。这说明大家也都注意到民间外交非常重要，民间的力量作用不可小看。我注意到我在《解放

今天也只有扩大开放，中国经济才能够奋起！**越是开放，越是与世界拥抱，越是能够有自己的底气！**